

《三国志》、《三国演义》与诸葛亮文化现象

于平

一段风雷激荡的三国纷争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诸葛亮。诸葛亮的人品才智、丰功伟业为后世所景仰,因之演成代代相传且不断拓展的诸葛亮文化现象。诸葛亮文化现象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广泛,论者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三国志》、《三国演义》与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关系,则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研究中不可存而不论的问题。

(一)

陈寿有良史之才,所撰《三国志》,后世誉为信史。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集中反映在其奉命撰定诸葛亮《故事》后给晋武帝的上言和《诸葛亮传》评中。陈寿在评价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忠诚,对群臣百姓的仁德以及治理国家的才干时,其褒美的言辞,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陈寿之评是否有“谀颂”的成份呢?大凡史家违心作“谀颂”之辞,一是慑于威势,二是有所企求,或者者兼而有之。诸葛亮早已作古,蜀汉王朝已经倾覆,威势是不存在的,同时也看不出陈寿此时“谀颂”诸葛亮,对他本人会有什么好处。须知陈寿乃亡国之余,而亡国之余言行必须慎之又慎。观李密《陈情表》,煞费苦心,哀婉陈辞,表白心迹,深恐引起晋武帝的猜忌。陈寿何人,敢于对“宣皇帝”的死对头大加谀颂?请注意,陈寿上言中这样一

段文字:“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陈寿颂扬晋武帝“荡然无忌”,与李密的哀婉陈辞,手法各异,其防范猜忌的良苦用心并无二致。或曰,正因陈寿与诸葛亮有私怨,恐实书其短会遭到讥议,故谀颂之以表白自己未借修史酬恩报怨。此种说法实属揣测之词。设身处地为陈寿设想,为顾及虚名而受实祸,实在是不可取。考察陈寿入晋后的经历,实际上很不得志,屡屡因摆不上桌面的“过失”遭受贬抑,未见任用以终。但是,陈寿并未因述史,特别是高度赞扬诸葛亮而获罪,足见在时人心目上,诸葛亮是当得起这样的称颂的。

诸葛亮当得起这样的称颂,当时就有佐证可寻。司马懿同诸葛亮苦斗多年而心服其为“天下奇才”;司马炎下诏表彰诸葛亮尽心国事、诸葛瞻临难死义,下令任用诸葛亮之孙诸葛京并命陈寿撰诸葛亮《故事》,为这个政治上势不两立的敌人树碑立传;孙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称诸葛亮才干优于子产,又说诸葛亮“忠谋睿睿,义形于主”,不在齐国贤相管仲、晏婴之下;孙吴丞相襄阳张悌因儿时为诸葛亮知顾,张悌对此铭刻在心,竟然成为激励张悌舍身取义的动力,足见诸葛亮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居于多么崇高的地位!

陈寿对诸葛亮爱敬之情虽发自内心而溢于言表，但并未对诸葛亮全方位的一味肯定和称颂，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干，陈寿就认为“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算不上象王子城父、韩信一流的名将。姑不论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干的评价是否允当，足见陈寿是力求实事求是地评价诸葛亮，并没有，也不敢胡乱“拔高”诸葛亮，更不用说给诸葛亮加上“神”的光环。因此，《三国志》记述、评价的诸葛亮是一个写实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代贤相。于是，以《三国志》为基础，衍生出一种基本格调以诸葛亮为“人”的文化现象，姑且称为关于诸葛亮的“雅”文化现象。由晋至唐，常璩、袁宏、习凿齿、袁准、张辅、傅玄、李兴、尚驰、裴度、吕温之流，对诸葛亮或论或赞，均为称颂其德才，且特别推崇的是诸葛亮之“德”。文学艺术领域中，也以颂扬诸葛亮的品格为主，杜甫的《蜀相》、《八阵图》为突出代表，均未有神化诸葛亮的倾向。

(二)

以《三国志》为基础的诸葛亮文化现象是“人”的文化现象，但在《三国志》成书后的一千六百余年的封建社会中，把诸葛亮作为一代贤相，以颂扬其崇高道德风范和安邦治国之才而定格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其影响面主要在有条件掌握文化知识，能读经史的士大夫阶层。广大民众在社会底层，无力掌握文化知识，处于“民可使由之”的被动地位，整日奔忙于生计，安邦治国的大事是不可能由他们来操心的，因而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那一套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内容，虽不能说普通民众一点不感兴趣，但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治理之道范围，只是为“肉食者”所关注，难以引起普通百姓的共鸣。

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当时百姓也是有口皆碑的，而这种口

碑是要流传的。不过，百姓的口碑往往反映的是诸葛亮德才功业的一鳞半爪，不可能象《三国志》和陈寿评那么全面、系统。而且，口碑的流传不象成书史籍的流传，在流传过程中，群众往往会不断加入自己的合理想象和理想色彩的内容，这就使得这些关于诸葛亮趣闻轶事的流传，越来越具有传奇色彩。加之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盛行，《三国志·魏志》之《方技传》，已具有明显的志怪倾向。此后，《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幽明录》、《齐谐记》、《冥祥记》、《冤魂志》等，均为魏晋南北朝时人所撰；能有这么多志怪小说面世，可见当时社会一时之风气。关于三国纷争和诸葛亮的民间传说，不可能不受此种风气的影响，仅举一例：

《诸葛亮集》引张华《博物志》云：

临邛火井一所，从广五尺，深二三文。并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亮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张华记述应该说较为客观。诸葛亮参观临邛一口火井，后来，此井火势转旺。但并未说诸葛亮的参观和火势转旺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刘宋人刘敬叔《异苑》，说法就不同了。

临邛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而更盛……。

刘敬叔说临邛火井经诸葛亮“一瞰而更盛”，传奇味道就出来了。后人往往对具有传奇色彩的说法更容易接受，唐人撰《初学记》，就取了临邛火井经“孔明一窥而更盛”的说法。

由此观之，除了存在一种以《三国志》为基础、主要传播于士大夫阶层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属于“人”的文化现象，或曰“雅”文化现象）外，还存在另一种主要流传于下层社会、具有传奇色彩的诸葛亮文化现象（以诸葛亮为“神”的文化现象，或曰“俗”文化现象）。这种具有传奇色彩的“俗”文化影

响范围比“雅”文化宽广得多，（诸葛亮尽心王事、自校簿书，流汗终日的史实远不如“死诸葛亮走生仲达”、“张飞喝断当阳桥”一类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更易为民众传诵）而且不断地为诸葛亮头顶的光环上添加“神”的光辉。

（三）

三国故事通过“俗”文化的渠道在民间广泛流传。杜宝《大业拾遗录》称，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表演，就有曹操擒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刘知几《史通》卷五《采撰》称，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句子。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涨，“说话”艺术进一步兴盛，出现了“说三分”的专门科目；金元之际，三国故事又大量改编为戏剧。在流传过程中，三国故事内容不断丰富，艺术性日趋完美，终于由罗贯中集其大成，雅俗兼收，写成了不朽名著《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成书后，由于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和无可竞争的影响力，十分自然地成了进一步衍生三国和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基础。

《三国演义》虽号称“七实三虚”，但它毕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为基础衍生出的诸葛亮文化现象与以《三国志》为基础衍生出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就有很大的差异。《三国志》是在述史，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典范，主要是以“立德”为人们所称道的。但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从宣扬正统儒学纲常名教的需要出发，树立了一批符合封建忠、孝、节、义规范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从单个形象而论，其忠孝节义虽不及诸葛亮全面，但确实

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有的人物形象还相当突出，这不能不使诸葛亮在这方面的形象有所冲淡。比如，在仁德问题上，《三国演义》突出渲染的是刘备，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史略》）。诸葛亮在这方面的形象是逊于刘备的。

《三国演义》以“仁德”塑造刘备，以“奸诈”刻画曹操，以“忠义”突出关、张，而把诸葛亮塑造为智慧的化身。本来三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军事斗争贯穿始终，政治、经济、外交，用人行政等等都是围绕如何赢得战争来进行的。《三国演义》自然也是以描写军事战争为重点。既然《演义》确定把诸葛亮作为智慧的化身来塑造，而描绘诸葛亮在立法施度治理国家、用人行政赏善惩恶方面如何多用智谋是有困难的，搞得不好就分不清什么是堂堂正正的智谋，什么是权诈。只有军事斗争是堂而皇之斗智的最好场所，作者可以在描写军事斗争中为渲染诸葛亮智谋发挥充分的艺术想象力。陈寿评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历史上的诸葛亮在指挥军事斗争中主要靠军队素质和战术取胜，少用奇谋本是事实，但《演义》却按照既定模式在诸葛亮军事斗争的“奇谋”上大做文章，越写越神，终于达到“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程度。

但是，人民群众更乐意接受的是艺术形象的诸葛亮，是作为“神”的诸葛亮文化现象。研究一代贤相诸葛亮的道德规范和为政之道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没有多少戏剧性的情节可供渲染；而《演义》中能掐会算，呼风唤雨的诸葛亮则可为人们津津乐道，绘声绘色，衍生出越来越丰富的文化现象，来满足人们不断丰富物质文化的要求。

（责任编辑 白 珍）